

主管单位

上海市嘉定区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

主办单位

上海嘉定博物馆 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

学术支持

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科举专业委员会

学术委员会委员(以姓氏笔画为序)

王日根(厦门大学历史研究所)
邓洪波(湖南大学岳麓书院)
朱瑞熙(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)
刘海峰(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)
许纪霖(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)
孙培青(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)
杨学为(教育部考试中心)
李世愉(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)
李弘祺(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系)
何忠礼(浙江大学历史系)
张亚群(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)
张希清(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)
陈文新(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)
郑若玲(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)
祝尚书(四川大学中文系)
郭培贵(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)
陶继明(上海中国科举博物馆)
黄霖(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)
龚延明(浙江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)
葛剑雄(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)
熊月之(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)

编辑委员会(以姓氏笔画为序)

主 任:沈 峰
副 主 任:邵 辉 姚 强
委 员:朱匀先 沈 中
主 编:姚 强
执行主编:刘海峰 邵 辉
副 主 编:林介宇
编 辑:王光乾 陈兴德 徐征伟 覃红霞

目 录

科举文化

- 谒圣礼、谒圣试与下马碑
——东亚科举与圣域的另一章 高明士 / 2

断代科举

- 北宋进士孙载生平史料钩沉 林介宇 / 28
- 南宋后期状元释褐职任考 周腊生 / 40
- 清代八旗科举考试历史叙略 多洛肯 路风华 / 50

科举地理

- 武学不微：南宋四川武举类省试考论 游君彦 / 82
- 明代盐城的科举功名群体及其任官状况 郭培贵 / 92
- 清代全国进士最小时空分布：县/科年的动态研究
——以浙江为例 沈登苗 / 105

科举学家访谈

东亚科举与教育史研究的交融

——高明士先生访谈录 高明士 刘海峰 / 154

科举学动态

第十六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学术研讨会综述 娄周阳 / 164

2018 金门学暨闽台科举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 李路昊 / 174

用历史告诉未来

——台湾学子重走科举路活动综述 李怀峰 王小凡 郝奇一 / 182

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开馆两周年暨首届科举遗址联盟单位合作交流

分享会综述 聂珍香 戴莹莹 / 189

科
举
文
化

谒圣礼、谒圣试与下马碑

——东亚科举与圣域的另一章*

高明士**

摘要：下马碑作为圣域的起点，礼教意义大于法律禁制。圣域的形成，可说是教育学术活动追求自主化的历史累积成果。科举制度史上的谒圣礼，始于唐玄宗开元五年（717）。当时规定贡举人在完成户部的报到手续，并于皇帝见讫后，赴国子监谒圣（孔子），同时学官为之开讲，质问其义。所以这种礼仪，含有教育意义。但宋太宗以后，改为及第后的拜谢礼仪，除谒圣外，并含谢师（学官），直至明清不变，已流为仪式性，乃至形式化。高丽王朝受宋制的影响，其科举制度也有谒圣、谢礼，李氏朝鲜王朝亦然。但李朝到太宗以后，除常科的这些礼仪而外，又有所谓“谒圣试”，这是国君临时幸学、谒圣时所举行的取士制度。自此以后，这种不定期的谒圣试，在李朝时代实施不下数十次，此制不见于同时代的中国，诚是东方盛事。

关键词：贡举；科举；谒圣礼；谒圣试；下马碑；国子监

一、前言：所谓“圣域”

“圣域”一词，最早出现，当见于《汉书》卷六十四下《贾捐之传》，记载元帝初元元年（前48），南越珠厓反，捐之反对用兵，其中提到：“臣闻尧舜，圣之盛也，禹入圣域而不优。”注引臣瓚曰：“禹之功德，裁入圣人区域，但不能优泰耳。”朱子亦曰：“尧舜之盛德，固备于天道，若‘禹入圣域而不优’，则亦其稟之有未纯处。”^①此处之圣域，指统治者的功

* 此文系就2011年5月26日在台湾新竹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所举办“‘东亚的书院与科举’国际学术研讨会”（第七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）专题演讲稿增补而成。

** 作者简介：高明士，台湾大学历史学系名誉教授。

① 新校本点《朱子语类》第61卷《孟子·尽心下·口之于味也章》，华世出版社，1987年，第1461页。

德,偏向政治意义,或可谓为王域,但以为禹尚有所不足。迄至后世,圣域用法甚为宽广,王域之中,尤指皇陵、宗庙、宫阙、各级官衙等地;此外,宗教如儒、释、道的圣人教化领域,乃至医学的经典医方领域等,均有其用例。类似圣域之用语,还有圣地、圣境等。

此处所称的“圣域”,特就儒门而言,包含两义:一为圣贤教化思维领域,具有形而上的抽象意义;一为学宫圣贤所在地,具体指供奉圣贤之地区,从进入儒门(如棊星门)开始计起,包括所有学宫地区,后来在儒门外左右各立一个下马碑,更具体指示圣域的起点,所有人到达此碑都要下马,以示尊崇。违者即违礼,有罚。

关于圣贤教化思维领域,中晚唐诸儒者提出如下说法。韩愈(768—824)《进学解》曰:

二儒者,吐辞为经,举足为法,绝类离伦,优入圣域。^①

二儒指孟子、荀子。吕温(772—811)《与族兄皋请学春秋书》曰:

某生于百代之下,不顾昧劣,凜然有志,翘企圣域,莫知所从,如仰高山,临大川,未获梯航。^②

右军曹濮等州观察使孔温裕《请修孔庙状》曰:

伏以礼乐儒学,教化根本。……近者以兖州频年灾歉,都废修营。……虽春秋无缺于释奠,而揖让颇紊于彝章。……圣域儒门,岂宜堙坠。^③

钱翊《授太仆卿赐紫李涪国子祭酒制》曰:

敕:右武以来,国子失教,圣域何远,儒风寢衰。^④

另外,《宋史》卷四十二《理宗本纪》(淳祐元年正月)甲辰,诏:

① 参看韩愈《韩昌黎集校注》卷一《进学解》,世界书局,1967年,第27页。

② 《全唐文》卷六二七。

③ 《全唐文》卷七九一。据《旧唐书·懿宗本纪》,孔温裕出任右军曹濮等州观察使,当在咸通六年(865)。

④ 《文苑英华》卷四〇〇《中书制诰·祭酒》,《全唐文》卷八三一。据余嘉锡考证,授李涪国子祭酒制,当在光化元年(898)。参看余嘉锡《四库提要辨证》第三册卷十五“子部·刊误二卷”条,中华书局,1980年,第871页。

朕惟孔子之道，自孟轲后不得其传，至我朝，周惇颐、张载、程颢、程颐，真见实践，深探圣域，千载绝学，始有指归。中兴以来，又得朱熹精思明辨，表里混融，使大学、论、孟、中庸之书，本末洞彻，孔子之道，益以大明于世。

此诏书是将宋五子周敦颐、张载、程颢、程颐、朱熹从祀于孔庙，同时明确指出他们是“深探圣域”。足见圣域是涵盖儒教、礼乐儒学，乃至孔子之道，其意指圣贤教化思维领域。学界迄今讨论圣域，不免偏向形而上意义。但孔温裕的“圣域儒门，岂宜堙坠”说，实兼具圣域的抽象与具象意义。

二、圣域与下马碑

拙稿此处拟特就圣域具象的学宫所在地，尤其下马碑的出现，进行讨论。

说到下马，清代流传的《弟子规》(原名《训蒙文》)中说：“骑下马，乘下车”，意思是看到长辈来了，如果是骑马的，就要下马；如果是坐车的，也要下车，向长辈行礼。这样的礼节，可说是自古留下来的礼制。论其渊源，下车或下乘礼恐怕要比下马礼更早，殷周以来当有其制。《管子·地数》曰“乘者下行，行者趋”，说的也是“乘下车”。^①《资治通鉴》卷四十七《汉纪》章帝章和二年条引尚书南阳宋意上疏曰“礼宠诸王，同之家人，车入殿门”，胡三省注曰：“汉制，太子诸王至司马门，皆下车，故谓止车门。”这个“止车门”用语，应当是特例。

唐玄奘口述、门人辩机编集《大唐西域记》卷九《摩伽陀国下》曰：

频毗娑罗王为闻法故，兴发人徒。自山麓至峰岑，跨谷凌岩，编石为阶，广十余步，长五六里。中路有二小窠堵波，一谓下乘，即王至此，徒行以进；一谓退凡，即简凡人，不令同往。

所谓“窠堵波”，指浮屠，即佛塔，或如附图一之 10 越南河内文庙下马碑外罩佛塔形样。^②

① 马非百按曰：“‘乘者下行，行者趋’，即《吕氏春秋·慎大篇》‘表商容之间，士过者趋，车过者下’之意，犹清人之所谓‘文武官员至此下马’矣。”(马非百：《管子轻重篇新论》，中华书局，1979年，第402页)其引《吕氏春秋》，指下车而言，但引清人所谓“下马”，恐非。下车与下马虽同是敬礼，但这是两个不同的表现方式。《管子·轻重篇》成书之年代，说法纷纭，大致可分为二，一为战国说，一为汉代说，而汉代说又分为若干期。近来利用新出土资料的考察，似以战国说较具说服力。参看巩曰国《从“疑古”到“走出疑古时代”——《管子·轻重》著作年代研究百年回首》，《管子学刊》2008年第3期，第122—125页。

② 引文据玄奘、辩机原著，季羡林等校注《大唐西域记校注》卷九《摩伽陀国下》二十三“鹫峯及佛迹”，中华书局，2000年，第725页；“窠堵波”之解释，见同书卷一“咀蜜国”条，第104页注2。

此处设有“下乘”，指示即使国王至此也要下车，徒步行进。此词之翻译，或许源自上述《管子》，后世所见之“下乘”，亦可能源自佛门的《西域记》，但“退凡”一词，似不见于俗世所使用的下乘、下马范围。

至于下马礼，恐要等到骑马技术成熟后才有可能出现，《西河旧事》曰：“白山冬夏有雪，故曰白山，匈奴谓之天山，过之皆下马拜焉。去蒲类海百里之内。”^①匈奴本为骑马民族，经天山，下马拜礼是很自然。在中国，比较成熟时期，宜在战国中期赵武灵王实施胡服骑射以后。唐朝李肇《国史补》卷下曰：“旧说，董仲舒墓门，人过皆下马，故谓之下马陵。”李肇所引用的“旧说”，可上溯至何时，难以说清，但可确定的是将董仲舒墓门称之为“下马陵”，也是特例，尤其是使用“陵”字。另一方面，亦可说明下马礼在汉以前当已存在，或可追溯至战国时期，如同赵之胡服骑射故事。下马陵之例，是对名臣墓门之下马礼，由此类推，经过皇陵门或太庙门，亦须下马。

在圣域设立下马碑，其始无可考，至迟到隋唐朝，王域当中的宫阙、太庙（宗庙）门前已立有下马牌。如长安城承天门外设有侍臣下马所，皇帝出行祭祀，銮驾还宫，到达此处时，銮驾权停，文武侍臣皆下马。^②太庙则立于重明门外。^③再者，唐朝《仪制令》已有官人街衢相遇须下马之规定，^④此事或可上溯至西晋《泰始令》。至宋神宗时，在太庙灵星门外设有下马牌；^⑤宋高宗时，在郊祀坛外设有“下马牌”六面。^⑥明朝在南京皇城四门也设有下马牌，^⑦孝宗弘治五年（1492）十月癸亥（二十六日），鸿胪寺序班郭理曾建言五事，其中提到“遵制度”，曰：

谓皇城四门设下马牌者，所以尊崇天极，表正四方此臣民所当遵守者也。近有官员人等到于大明门下马牌侧已入牌内三五步方下轿马，至上马轿亦如之。又有愚顽者，懒于下马，其过北安等三门，顺街斜走数步，常行抄过，甚为不敬。乞命守门官军常加巡视，务须未至牌边先下马轿，过牌数步，方许骑乘。^⑧

① 范晔：《后汉书·明帝纪》永平十七年（74）十一月条，李贤等注引。

② 参看《通典》卷一〇九《礼典·开元礼纂类四·吉礼一·皇帝冬至祀圜丘·銮驾还宫（注曰：上辛零祀同）》；《通典》卷一二四《礼典·开元礼纂类十九·嘉礼三·皇帝于明堂读五时令·銮驾还宫》；《大唐开元礼》卷四《皇帝冬至祀圜丘》“銮驾还宫”条。

③ 《大唐开元礼》卷一一〇《皇太子加元服》“皇太子谒太庙”条。

④ 参看仁井田陞《唐令拾遗》，《仪制令》一六乙（开七）（开二五）条，东京大学出版会1964年覆刻，初版发行于1933年，第493页。日本《养老令》、《仪制令》“遇本国司”条规定略同。

⑤ 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三一六“宋神宗元丰四年六月”条。

⑥ 《宋会要辑稿·礼二之七·郊祀坛殿大小次》“高宗绍兴十三年”条。

⑦ 《大明会典》卷四十四《文职衙门·礼部朝仪》“入朝门禁”条记载景帝景泰三年令。

⑧ 《明实录》卷六十八“孝宗弘治五年十月癸亥（二十六日）”条。

此处具体说明设置下马牌的目的,在于“尊崇天极,表正四方”。所谓天极,秦始皇曾作“极庙,象天极”^①,也就是象征天帝所在,用以表正四方。易言之,过了下马牌(碑),进入宫阙、太庙祖灵之地,其权威性,是来自天帝在人间的德音,所以臣民过此皆须下马。《唐律·名例律》“十恶”条(总6条)规定第二恶曰“谋大逆”,注曰:“谓谋毁宗庙、山陵及宫阙。”《疏议》解释注文曰:

有人获罪于天,不知纪极,潜思释憾,将图不逞,遂起恶心,谋毁宗庙、山陵及宫阙。宗者,尊也。庙者,貌也。刻木为主,敬象尊容,置之宫室,以时祭享,故曰“宗庙”。山陵者,古先帝王因山而葬,黄帝葬桥山即其事也。或云,帝王之葬,如山如陵,故曰“山陵”。宫者,天有紫微宫,人君则之,所居之处故曰“宫”。其阙者,《尔雅·释宫》云:“观谓之阙。”郭璞云:“宫门双阙也。”《周礼·秋官》“正月之吉日,悬刑象之法于象魏,使人观之”,故谓之“观”。

此即以天极、紫微宫,“人君则之”来说明其神圣性,臣民不可侵犯,否则以十恶第二“谋大逆”论罪。从下马牌(碑)开始到内部诸建筑物所代表的神圣性,不可随意侵犯,自可理解。至清代,北京紫禁城内各门,是以大清门作正门,禁止车辆人马过往,余门仍设立下马牌。^②

至于在圣庙建立下马碑,起始时间亦不明,其过程可能先见于曲阜孔子庙,再推广至全国的庙学。较早的记录,如金章宗时,在曲阜孔子庙棂星门左右各设置一个下马碑(详后)。明清时期,举凡陵墓、寺庙、宫殿之前,均设有下马牌或下马石,指示自此处起,进入神圣的地方,也就是圣域,全国人均应遵礼守法。

违礼的具体罚则,至明清有详细规定,例如《大清会典》(康熙朝)卷一一七《刑部·律例·兵律·宫卫·直行御道》曰:

顺治初定,凡至下马牌处,骑马竟过者,鞭五十。看守人不知者,责二十七鞭。

又曰:

(顺治)十八年,议定:凡骑头畜竟过下马牌者,笞五十。看守人役失于防范

① 《史记》卷六《秦始皇本纪》“始皇二十七年”条,《索隐》曰:“为宫庙,象天极,故曰极庙。《天官书》曰:‘中宫曰天极’是也。”《史记》卷二十七《天官书》又说:“中宫天极星,其一明者,太一常居也。”

② 《清实录》卷二五二《仁宗睿皇帝实录》嘉庆十六年(1811)十二月癸亥条。

者，答四十。

《大清律例》(雍正律)卷十三《兵律·宫卫·直行御道》条例亦同上列规定，其曰：

凡至下马牌不下而竟过者，答五十。看守人役失于防范者，答四十。^①

《大清律例》(乾隆律)卷十八《刑律·贼盗上·盗园陵树木》条例曰：

车马过陵者，及守陵官民入陵者，百步外下马。违者，以大不敬论，杖一百。^②

这些规定，或许源自明代律例，例如乾隆律条，实源自顺治例，而顺治例则源自明太祖洪武二十六年敕令。^③《大明会典》卷九十《礼部·陵寝》曰：

车马过陵者，及守陵官民入陵者，百步外下马。违者，以大不敬论。

按，“大不敬”为唐明清律的“十恶”之一，但乾隆律明定杖一百，较《唐律·卫禁律》(总 58 条)规定徒二年为轻。

又，《清实录》卷二五一《文宗显皇帝实录》“咸丰八年(1858)四月甲子”条，谕内閣曰：

前据御史来仪奏参奉天海城县知县鲍师钊贪污不职各情，当交庆祺严参惩办。兹据该将军等访查，鲍师钊在典史任内，赴庙行礼，至下马牌，未曾下马。失察家人私受商船饭钱，且于本城绅商，为其母祝寿，馈送礼物，辄行收受。实属不知检束，鲍师钊着即革职，以示惩儆。

奉天海城县知县鲍师钊贪污不职各情，包括“在典史任内，赴庙行礼，至下马牌，未曾下马”。此处的“庙”不知何庙，当时县城中最重要庙宇，恐是县学的孔庙，根据前引条例“凡至下马牌不下而竟过者，答五十”。鲍师钊被革职的理由，在于尚有“贪污不职各

① 田涛、郑秦点校：《大清律例》卷十八，法律出版社，1999年。

② 前引田涛、郑秦点校《大清律例》卷二十三。

③ 参看黄彰健编著《明代律例汇编》卷十八《刑律·贼盗》“万历间刑条例”(一款)，“中研院”历史语言研究所，1979年，第739页。

情”一节。无论如何,由此事例,可看出清廷较过去诸王朝更重视圣域,遍设下马牌,就是提示此旨。

下马牌的设置,看似小事,但意义重大,它有如今日政府机构的警卫室,直接管控人员的出入,其意义是执法;而下马牌或下马石通常无人员在旁监视,下马是礼,“至下马牌不下而竟过者”即是违礼,成为犯罪构成要件,所以此处的违礼,也就是违法,正是“失礼入刑”的佳例。这样的制度,普遍存在于同时期的东亚各国。今日看来,或许不屑一顾,但缅怀过去,古今之异,甚至是东西文化之别,从下马牌之例,可窥知一二。以下特就文庙(孔庙)的下马牌进行讨论。

文献上,在曲阜孔子庙门外设置下马碑,是始于金章宗明昌二年(1191),其历史意义重大(明陈镐《阙里志》卷十一《林庙志》)。此事在“庙学制”的尊孔政策发展过程,或者树立圣域的神圣性上,实是一项重要突破。简单说,使圣域的起点更为具体化。至清朝,圣域尊孔措施,更超越以往诸王朝。金、清王朝,均非汉族政权,其于圣域尊孔之认真态度,令人注目。但此事并非指过去不尊孔或者无圣域概念。例如汉高祖十二年(前195)十一月过鲁时,以太牢祠孔子(《汉书·高帝本纪》)。此为汉以来祭祀孔子之始,既然以太牢礼祭之,高祖至庙门前必先下马或下车,只是尚无立下马碑而已。东晋成帝咸康元年(335),帝讲诗通,释奠于太学,此为帝王释奠之始(《宋书·礼志上》)。^①既曰释奠,成帝到太学门前下车或下马是必要的。又如宋高宗绍兴十四年(1144)三月,国子监完成修建孔庙的大成殿,奉安庙像,高宗幸学,《宋史》卷一一四《礼志·嘉礼·视学》有具体的描述,其曰:

上服鞞袍,乘辇入监,止辇于大成殿门外。入幄,群臣列班于庭。帝出幄,升东阶,跪上香,执爵三祭酒,再拜,群臣皆再拜,上降入幄。分奠从祀如常仪。^②

高宗是“乘辇入监,止辇于大成殿门外”,此即在孔庙大成殿门外下车,然后至大成殿对孔子像上香,行跪拜礼,此时大成殿门外也还没立下马碑。如前所述,曲阜孔子庙门(大成殿门)外设置下马碑,始于金章宗明昌二年(1191),此制有无适用于国内的学校孔庙,不得而知,但章宗尊孔,重视学校教育,则为事实。例如同年四月,以孔子五十一代孙孔元措袭封为衍圣公(《阙里志》卷十四《诏诰》)。同年五月戊辰,诏:“诸郡邑文宣王庙隳废者,复之。”(清孔继汾《阙里文献考》卷十四《祀典》)四年,亲临释奠于先圣

^① 《晋书·礼志上·吉礼》亦同。又,参看庞钟璐《文庙祀典考》卷二,台北中国礼乐学会,1977年,第6页(总第215页)。

^② 马端临:《文献通考》卷四十五《学校考·幸学养老》亦同。

《阙里志》卷六《祀典》》；至泰和四年(1204)二月，如前所述，下诏州郡无宣圣庙者，增修之。这些措施中，均无明言各地文庙亦须建置下马碑之事，可能一时尚无推广到各地。但《陕西省》《定远厅志》(光绪五年刊本，收入《中国方志丛书》第270号)卷九《学校志》在叙述“历代尊崇典礼”时，亦记述“金章宗明昌二年诏庙门置下马牌”。此处无详细说“庙门”是指曲阜孔庙还是包含全国各地孔庙，而此节所叙述的内容是包括全国的郡县学，依此看来似乎可适用于全国。实际如何，有待查考。

明宪宗成化十六年(1480)春二月辛酉，“命所在过孔门者皆下马”(《阙里文献考》卷十四《祀典》)。既然过孔门者皆须下马，则孔门之前必须立有下马碑。此处所谓的“孔门”，当不只是指曲阜孔门而已，应当包括全国各地的孔门，也就是全国所有的“庙学”。所以至迟到明宪宗成化十六年(1480)春二月，已将庙门前建置下马碑的规定，推行到全国庙学之地。到清代，至迟乾隆朝已规定在安定门内、太学之左的先师庙(即孔庙)，其于东西成贤街设有牌坊各一，下马牌各一。^①

以下试举东亚地区今日尚可见到的下马碑(牌、石)实例。

附图一 孔庙(文庙)门前下马碑



01 山东曲阜孔庙下马碑 2002.8 摄



02 北京国子监孔庙下马碑 2002.8 摄

^① 《大清会典则例》(乾隆朝)卷一二六《工部·营缮清吏司·坛庙》，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。



03 台湾府学孔庙下马碑 1994.1 摄



04 韩国成均馆孔庙下马碑 1981.5 摄



05 韩国成均馆孔庙下马碑背面 1981.5 摄



06 韩国成均馆孔庙下马碑 2008.6 摄
(立于成均馆大学校门左内侧)



07 韩国成均馆孔庙下马碑背面 2008.6 摄



08 韩国大邱乡校 1982.5 摄



09 韩国安东永川乡校孔庙下马碑 2008.5 摄



10 越南河内国子监文庙前下马碑 2002.12 摄

附图二 其他下马碑



01 日本熊野那智大社
山下的下马碑 2009.11 摄



02 日本熊野那智大社
山下的下马碑 2009.11 摄



03 日本奈良药师寺下车牌 2009.3 摄



04 日本京都东寺(又名教王护国寺)下乘牌 2014.1 摄



05 日本德川家族墓下乘碑(茨城县常陆太田市瑞龙山) 2001.10 摄



06 德川家族墓地下乘碑 2001.10 摄